

# 城乡居民不同来源收入对其消费行为的影响

## ——基于 2002-2013 年省级面板数据的实证检验

易行健, 朱力维, 杨碧云

**摘要:** 本文基于 2002-2013 年的省级面板数据, 实证分析了城乡居民不同来源收入对其消费行为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 (1) 城乡居民收入对消费的影响显著为正, 城镇、农村消费都存在较强的消费惯性; (2) 对城镇居民而言, 工资性收入和财产性收入对居民消费的影响显著为正, 系数值分别为 0.201 和 0.051; (3) 对农村居民而言, 四项不同来源收入对居民消费的影响均显著为正, 农村不同来源收入对消费影响的大小排序为: 经营性收入 > 工资性收入 > 转移性收入 > 财产性收入。

**关键词:** 工资性收入; 财产性收入; 居民消费; GMM

DOI:10.19313/j.cnki.cn10-1223/f.2018.05.006

### 一、引言

近 20 年来, 消费不足成为我国宏观经济表现中的突出特征之一, 在整体国民经济中的占比呈现下降趋势。1995-2015 年, 中国 GDP 平均增长速度达 9.4%, 最终消费率却从 1995 年的 59.1% 下降至 2015 年的 51.82%, 其中居民消费率更是从 46.7% 下降到 38.05%, 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sup>①</sup>。同时, 我国城镇居民平均消费倾向也由 1995 年的 0.82 下降到 2015 年的 0.62, 同期农村居民平均消费倾向由 0.83 下降到 0.70<sup>②</sup>。因此, 如何释放城乡居民消费潜力, 实现经济增长方式从投资

**[基金项目]** 2013 年度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71373057)、2014 年度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71403061)、2015 年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 (15ZDA013)、广东外语外贸大学高层次人才项目与广东省高等教育“创新强校工程”项目 (GWTP-GC-2014-01)。

**[作者简介]** 易行健 (1974-), 男, 湖南湘乡人,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金融学院教授、院长, 经济学博士、硕士生导师, 研究方向: 宏观经济学与应用计量经济学;

朱力维 (1994-), 女, 湖南娄底人,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金融学院, 硕士研究生, 研究方向: 宏观经济学与应用计量经济学;

杨碧云 (1977-), 女, 湖南华容人,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金融学院教授, 经济学博士、硕士生导师, 研究方向: 国际经济学与公共经济学。

① Jonathan Garner (2005) 认为世界各国居民消费率的平均水平为 60%。

② 2013 年城乡居民收入, 消费数据口径发生了改变, 从 2013 年起, 国家统计局开展了城乡一体化住户收支与生活状况调查。

拉动向消费拉动转型,成为当前我国宏观调控的重要任务。在此期间,我国城乡居民不同来源收入占总收入比重发生了较大变化,2002-2013年,城镇居民工资性收入、转移性收入占比分别下降了6.12和0.77个百分点,而财产性收入、经营性收入占比分别上升1.49和5.41个百分点;农村居民除了经营性收入占比下降以外,工资性、转移性以及财产性收入占比分别上升11.31、4.85和1.25个百分点<sup>①</sup>。

消费者在做出消费决策时会内在地将不同来源收入加以区分,从而使得不同的收入有不同的消费倾向(Thaler, 1999)。因此,不同来源收入性质的差异和它们在收入结构中地位的变化也可能使得不同来源收入对消费产生的影响不同,虽然已有文献(张秋惠和刘金星,2010;李春琦和张杰平,2011;雷理湘和胡浩,2015)探讨了不同来源收入,同时考虑工资性收入、经营性收入、转移性收入与财产性收入对居民消费的影响,但是通过文献梳理,发现学界就不同来源收入对消费的影响并没有达成统一的结论(李春琦和张杰平,2011)。因此,在我国不同来源收入占总收入比重不断变化,而居民平均消费倾向也呈现下降趋势的现实背景下,本文尝试利用2002-2013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实证研究不同来源收入对城乡居民消费行为的影响以及影响是否存在差异,并结合中国的实际情况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

## 二、文献综述

### (一) 国外文献回顾

20世纪30年代以来,消费储蓄理论产生了一系列研究,最早是凯恩斯的绝对收入假说与杜森贝里的相对收入假说,他们认为收入是消费的重要决定因素。Thaler(1990)认为生命周期假说中基于不同来源财富产生的收入带来的边际消费倾向都是相等的说法是有缺陷的,他探讨了不同类型财富的改变对边际消费倾向的影响,发现获得一笔“意外之财”的边际消费倾向取决于这笔收入的大小,获得的收入较少将会被划入当期收入被消费,反之会进入财产账户储蓄。Carriker等(1993)基于Thaler(1990)认为收入是可替代的假说,利用美国堪萨斯州农场管理协会1976-1990年165个农场的的面板数据和加权最小二乘法实证研究发现:每个家庭成员的政府支付与非农场收入的短期和长期边际消费倾向分别是0.05和0.21,而农场收入只有0.02与0.12,远低于政府支付与非农场收入,这一结论支持了不稳定收入的边际消费倾向低于稳定收入的边际消费倾向的论点。Sand(2002)发现20世纪70年代挪威农户的收入体系发生了某种程度改变,非农业收入、政府转移性收入在可支配收入中的比重上升,而农业收入(生产性收入)由于其不稳定性等特征,已经不再是农业收入体系中重要的组成部分。他参照Carriker等(1993)的理论模型——该理论模型考虑到了消费者的消费习惯以及收入的可替代性等因素——利用1976-1997年挪威258名农户的面板数据和系统GMM的估计方法,实证研究发现258名农户农场收入的边际消费倾向约为0.14,非农场收入的边际消费倾向约为0.24,政府转移性收入的边际消费倾向约为

<sup>①</sup>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

0.20。国外文献认为农场收入低于非农场收入与政府转移性收入的边际消费倾向主要是因为农场收入是风险性较大的收入，而非农场收入与转移性收入都是较稳定的收入，会拉动消费。国外的理论或者实证文献基于不同收入结构的视角探讨居民消费问题，虽然对不同来源收入的划分与国家统计局的划分不一致，也没有涉及到财产性收入等变量，但是国外文献的实证结果均表明，农场收入等非稳定性收入的边际消费倾向低于非农场收入等稳定性收入的边际消费倾向，原因是稳定收入的居民无需太多储蓄来应对收入变动给自身带来的影响。

## （二）国内文献回顾

中国国家统计局基于不同来源将总收入划分为工资性收入、经营性收入、财产性收入和转移性收入，部分学者探讨了农村不同来源收入对居民消费的影响，但没有达成统一的结论。张秋惠和张金星（2010）利用1997-2007年省级面板数据，使用固定效应模型，发现农村居民四项收入对消费的影响均显著为正，不同来源收入边际消费倾向的大小排序为：转移性收入>财产性收入>经营性收入>工资性收入。该文献对此的解释是：作为家庭基本收入的工资性收入与经营性收入具有持久性收入的特点，是农村经营性支出和预防性储蓄的主要来源，而转移性收入、财产性收入被认为是“意外之财”，一般在支出的时候较随意，对消费的拉动效应较为明显。方福前和张艳丽（2011）借鉴Carriker等（1993）的模型，考虑了消费者的消费惯性和收入间的不完全替代关系，利用我国30个省份2001-2008年的省级动态面板数据和系统GMM的方法实证研究发现：农村居民工资性收入与经营性收入的边际消费倾向要低于转移性收入和财产性收入，四项收入的边际消费倾向大小分别为：0.196、0.276、0.304、0.301，这与张秋惠和张金星（2010）的结论相似，但是该文献给出的解释是：农村居民工资性收入和经营性收入的不确定性较大，比较容易受到自然气候、市场风险等因素的影响，因此这种不确定性需要用储蓄来弥补，从而拉低了居民消费。不同于方福前和张艳丽（2011）、张秋惠和张金星（2010），雷理湘和胡浩（2015）在凯恩斯消费函数的基础上，利用我国31个省市自治区1997-2013年的省级面板数据和固定效应模型实证研究发现：农村居民四项不同来源收入对消费的影响均显著为正，其边际消费倾向大小排序为：工资性收入>经营性收入>转移性收入>财产性收入。该文献给出的解释是：2010年前，工资性收入、经营性收入波动性较大；2010年后，工资性收入、家庭经营性收入波动性明显降低，居民会将这两类收入增加的大部分用于消费。部分学者探讨城镇不同来源收入对居民消费的影响，方福前和张艳丽（2011）利用我国30个省市自治区2002-2008年的省级动态面板数据和系统GMM的方法实证研究发现：城镇居民工资性收入和经营性收入的边际消费倾向分别为0.75、0.79，财产性收入和经营性收入的边际消费倾向分别为0.65、0.43，前两项收入的边际消费倾向明显大于后两项收入的边际消费倾向，主要是因为对于城镇居民来说，工资性收入和经营性收入是稳定并且可以预见的，因此人们对这两项收入不会储蓄反而会消费，而财产性收入与转移性收入的不确定性较大，人们需要增加储蓄的份额来弥补这种收入的波动。

综上所述，目前已经有文献探讨了不同来源收入对居民消费的影响，但是文献得出的结论不

尽一致,我们认为主要有以下两点原因:第一,样本区间设定的不一致导致了结果的差别<sup>①</sup>;第二,可能存在遗漏变量偏差的问题<sup>②</sup>。本文尝试从以下两方面展开进一步的研究:(1)以往文献对居民不同来源收入与消费的研究未考虑居民消费水平的影响因素,本文尝试在数据可得性的基础上,将影响居民消费水平的众多因素纳入模型,以系统考察决定城乡居民消费的共性特征;(2)本文尝试将工资性收入、财产性收入、转移性收入、经营性收入引入基准方程,在控制影响居民消费水平不同因素的基础上,考察不同来源收入对城乡居民消费的影响效应。

### 三、实证检验

#### (一) 计量模型设定

本文参照 Carriker 等(1993)的方法,将居民人均消费水平作为因变量,自变量的选择按照理论的关联性和数据可得性原则进行,考虑到居民消费的习惯以及收入的不完全替代性等因素,建立了如下的动态面板数据模型:

$$C_{it} = \beta_0 + \beta_1 C_{i,t-1} + \sum_{s=1}^m \beta_{1s} Y_{s,it} + X * \delta + v_{it} \quad (1)$$

其中下标  $i$  与  $t$  分别表示地区与时期,  $C$  表示人均居民消费水平,  $Y_{s,it}$  代表了居民  $i$  在时期  $t$  从第  $s$  种收入来源中所获得的收入,本文主要关注四种不同来源的收入,即工资性收入、财产性收入、转移性收入与经营性收入。 $\beta_{1s}$  则是这四种不同来源收入的短期边际消费倾向,  $X$  代表一系列影响居民消费水平的因素,  $v$  是残差项。考虑到我国居民消费可能受习惯的影响,当前消费水平与过去消费水平密切相关,我们建立了动态面板数据模型,在模型中引入了消费的滞后项  $C_{i,t-1}$  作为解释变量。由于滞后项  $C_{i,t-1}$  与残差项  $v$  相关,使用固定效应或者随机效应模型将会导致参数的有偏与非一致性。针对这种内生性问题,我们参照 Blundell 和 Bond (1998),采用系统 GMM 方法对模型进行估计。

#### (二) 数据来源、变量选择与描述性统计

本文使用的数据是 2002-2013 年省级面板数据,选择这一区间的主要原因是:2013 年以前城乡收入、消费等数据的调查口径来源于城镇、农村住户抽样调查,2013 年以后的数据来源于城乡一体化住户调查,为避免调查口径不一致引起的测量偏差,本文选择了 2013 年以前的数据作为样本。其中城镇的计量分析数据使用的是 2002-2013 年中国 31 个省区市的省级面板数据,样

① 张秋慧和张金星(2010)的研究采用了 1997-2007 年的数据和固定效应模型,而雷理湘和胡浩(2015)的研究同样采用了固定效应模型,但是使用了 1997-2013 年的数据,得出了不一致的结论。

② 方福前和张艳丽(2011)的研究利用我国 30 个省份 2002-2008 年的数据,但是未加入任何控制变量,侯石安、赵和楠(2012)同样利用 2002-2008 年城镇居民的省级面板数据研究居民收入来源对消费的影响,将通货膨胀预期作为控制变量引入,得出了不一致的结论。

本数量为 372；农村的计量分析数据使用的是 2002-2013 年中国 26 个省区市<sup>①</sup>的省级面板数据，样本数量是 312。本文所采用的省级面板数据均来源于中国国家统计局统计数据与《中国统计年鉴 2014》。

方程 (1) 的被解释变量为居民人均消费水平， $Y_{s,it}$  为各省区市人均工资性收入、人均财产性收入、人均经营性收入、人均转移性收入。利用城镇与农村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对四项收入进行平减而得出，我们将主要关注这四个变量对城乡居民消费的影响效应。其他影响居民消费的变量  $X$  主要包括以下：收入不平等变量 *inequality*、收入增长率 *increase*、通胀率 *inflation*、少儿抚养比 *childratio* 以及老年抚养比 *oldratio*。参照陈春良和易君健 (2009)，采用城乡收入之比作为收入不平等 *inequality* 的代理变量；Modigliani (2004) 将收入增长率作为重要解释变量对消费进行研究，将其放入回归模型考察与消费的关系；为考察不确定性对居民消费的影响，参照易行健和杨碧云 (2015)，采用通货膨胀率 *inflation* 作为不确定性的代理变量；依据生命周期理论，少儿抚养比 *childratio* 及老年抚养比 *oldratio* 会影响居民消费水平，将其作为控制变量引入回归模型。

由于本文对城镇与农村分别进行计量回归，因此将统计性描述表分为城镇与农村两部分，定义与统计性描述如表 1、表 2 所示。

表 1 城镇样本变量定义与描述性统计

变量	定义	单位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consume	人均消费水平	元	9 006	3 332	4 462	21 707
income	人均可支配收入	元	12 531	5 173	5 944	33 809
wage	人均工资性收入	元	9 798	5 473	2 706	33 235
operate	人均经营性收入	元	966.0	677.1	0	3 927
transfer	人均转移性收入	元	3 238	1 594	143.6	10 206
property	人均财产性收入	元	281.1	266.2	1.167	1 590
increase	收入增长率	%	11.6	3.72	5.20	24.5
inequality	收入不平等	%	304.6	62.1	182.9	552.5
inflation	通货膨胀率	%	0.219	2.81	-9.01	5.64
childratio	少儿抚养比	%	25.2	7.47	9.64	44.7
oldratio	老人抚养比	%	12.2	2.50	6.71	21.9

表 2 农村样本变量定义与描述性统计

变量	定义	单位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consume	人均消费水平	元	2 893	1 265	1 138	8 632
income	人均纯收入	元	3 822	1 746	1 490	11 822
wage	人均工资性收入	元	1 457	1 094	132.0	6 756

① 北京、天津、上海、重庆四个直辖市的数据予以剔除，主要基于以下两个原因：第一，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2002-2013 年，北京、天津、上海、重庆城镇人口平均占比分别为 82.70%、70.10%、61.47%、49.21%，重庆近年来城镇人口比重迅速上升（顾建仁、王紫燕，2016），农村人口比重相对较小；第二，北京、天津、上海、重庆缺乏农村消费价格指数。西藏由于统计数据不全也不纳入研究范围。

(续表)

变量	定义	单位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operate	人均经营性收入	元	1 999	665.8	888.6	4 713
transfer	人均转移性收入	元	254.5	175.2	25.20	1 039
property	人均财产性收入	元	111.2	100.7	0.400	776.5
increase	收入增长率	%	11.9	4.44	0.468	22.5
inflation	通货膨胀率	%	0.216	3.26	-1.01	6.87
inequality	收入不平等	%	307.9	56.4	205.5	475.9
childratio	少儿抚养比	%	26.2	6.59	13	44.7
oldratio	成人抚养比	%	11.9	2.14	6.95	20

注：(1) 少儿抚养比定义为 0-14 岁人口与 15-64 岁人口之比；老年抚养比定义为 65 岁及以上人口与 15-64 岁人口之比；(2) 国家统计局没有通货膨胀率的直接指标，因此城乡通货膨胀率按照城乡居民消费价格指数衡量。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

### (三) 实证检验

#### 1. 基准回归

本部分为基准回归。为提高实证回归的准确性，我们在实证回归中对与收入、消费相关的变量进行对数处理，一方面能够使得数据更加平稳，另一方面也削弱了模型的共线性、异方差性。采用系统 GMM 方法对居民消费水平的影响因素进行动态面板数据模型估计，为了进行对比，也采用 OLS 与固定效应方法将静态与动态面板数据模型的结果列出来。表 3、表 4 中的回归方程(1)、(2) 是采用 OLS 方法进行混合回归的结果，方程 (2) 控制了年份虚拟变量，方程 (3) 是采用固定效应方法对静态面板数据进行估计的结果，方程 (4)、(5)、(6) 分别是采用 OLS、固定效应方法和系统 GMM 方法估计动态面板数据模型的结果。

表 3 为城镇居民消费水平影响因素的计量检验结果。从表 3 方程 (6) 系统 GMM 的估计结果来看，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对居民消费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每提高 1%，人均消费增长 0.366%。城镇居民消费存在较强的惯性，惯性系数为 0.508。我们发现少儿抚养比对城镇居民消费的影响在 1%的水平上显著为负，这可能是因为家庭孩子数量减少后，父母对孩子的人力资本投资会增加，如果这种抚养费用的增加超过了因孩子减少而增加的储蓄，则消费率会不降反升（李文星等，2008）；而老年抚养比对居民消费影响的弹性系数显著为正，符合生命周期理论假说。通货膨胀率对居民消费水平影响系数的符号符合预期，即通货膨胀率的上升将降低人均居民消费。

表 4 为农村居民消费水平影响因素的计量检验结果。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对居民消费的影响显著为正，农村人均纯收入每提高 1%，人均消费上升 0.297%。农村居民消费也存在较强的惯性，惯性系数为 0.730。与城镇居民相比，农村居民当期消费更大程度上受制于上期消费，这可能是因为农村居民收入水平较低，面临的消费选择与消费方式较少，因此很难改变之前的消费行为（方福前和张艳丽，2011）。城乡收入系数显著为正，说明城镇居民收入相对农村居民收入的上升会提高农村消费的水平。农村家庭人均纯收入增长率对居民消费的影响显著为正。但是我们没有发现少儿抚养比、老年抚养比以及通货膨胀率能显著影响农村居民消费水平的证据。

表 3 城镇居民消费水平影响因素的计量检验结果

	(1)	(2)	(3)	(4)	(5)	(6)
	静态 OLS	静态 OLS	静态 FE	动态 OLS	动态 FE	系统 GMM
变量	consume	consume	consume	consume	consume	consume
L.consume				0.854*** (0.045)	0.584*** (0.066)	0.508*** (0.104)
income	0.849*** (0.027)	0.929*** (0.048)	1.005*** (0.059)	0.138*** (0.042)	0.539*** (0.101)	0.366*** (0.086)
childratio	-0.411** (0.155)	-0.386** (0.145)	-0.071 (0.150)	-0.058 (0.045)	-0.048 (0.123)	-0.303*** (0.089)
oldratio	0.303 (0.341)	0.198 (0.388)	0.361 (0.234)	0.111 (0.086)	0.219* (0.123)	0.326* (0.180)
inflation	0.068 (0.060)	-0.089 (0.170)	-0.016 (0.174)	-0.363** (0.163)	-0.230* (0.118)	-0.250*** (0.090)
increase	-0.288*** (0.094)	-0.167* (0.089)	-0.083 (0.097)	0.601*** (0.142)	0.398*** (0.093)	0.236 (0.180)
inequality	0.034** (0.016)	0.045*** (0.016)	0.056* (0.030)	0.003 (0.006)	0.020 (0.035)	0.011 (0.010)
常数项	1.092*** (0.240)	0.249 (0.465)	-0.623 (0.651)	0.006 (0.156)	-1.453* (0.748)	1.027*** (0.231)
年份虚拟变量	否	是	是	是	是	是
R <sup>2</sup>	0.970	0.974		0.993		
组内R <sup>2</sup>			0.986		0.99	
AR(1)						0.041
AR(2)						0.443
Hansen 检验						0.213
省份个数	31	31	31	31	31	31

注：(1) \*、\*\*、\*\*\*分别表示在 10%、5%、1%显著水平下的显著性；  
(2) 残差的一阶和二阶序列相关检验和 Hansen 检验所报告的均为 P 值。

表 4 农村居民消费水平影响因素的计量检验结果

	(1)	(2)	(3)	(4)	(5)	(6)
	静态 OLS	静态 OLS	静态 FE	动态 OLS	动态 FE	系统 GMM
变量	consume	consume	consume	consume	consume	consume
L.consume				0.865*** (0.035)	0.578*** (0.077)	0.730*** (0.146)
income	1.019*** (0.030)	1.010*** (0.070)	0.744*** (0.108)	0.123*** (0.035)	0.181* (0.092)	0.297* (0.156)
childratio	-0.438** (0.196)	-0.477** (0.215)	-0.491* (0.263)	-0.116** (0.049)	-0.186 (0.149)	-0.165 (0.102)
oldratio	0.231 (0.538)	0.151 (0.533)	0.921*** (0.331)	-0.035 (0.116)	0.446 (0.307)	-0.179 (0.181)
inflation	-0.250 (0.153)	0.385* (0.222)	0.361* (0.219)	0.023 (0.276)	0.075 (0.240)	-0.321 (0.198)
increase	0.096 (0.195)	0.072 (0.250)	-0.141 (0.153)	0.208 (0.128)	0.095 (0.138)	0.238* (0.125)
inequality	0.176*** (0.024)	0.175*** (0.037)	0.062* (0.034)	0.022** (0.008)	0.010 (0.022)	0.065** (0.031)
常数项	-0.892*** (0.284)	-0.772 (0.717)	1.782* (1.014)	0.048 (0.115)	1.967*** (0.674)	-0.404* (0.239)

(续表)

	(1)	(2)	(3)	(4)	(5)	(6)
	静态 OLS	静态 OLS	静态 FE	动态 OLS	动态 FE	系统 GMM
年份虚拟变量	否	是	是	是	是	是
$R^2$	0.960	0.962		0.990		
组内 $R^2$			0.98		0.985	
AR(1)						0.004
AR(2)						0.149
Hansen 检验						0.379
省份数量	26	26	26	26	26	26

注：(1) \*、\*\*、\*\*\*分别表示在 10%、5%、1%显著水平下的显著性；

(2) 残差的一阶和二阶序列相关检验和 Hansen 检验所报告的均为 P 值。

## 2. 城乡居民不同来源收入是否显著影响居民消费水平

本部分我们考虑城乡居民不同来源收入是否显著影响居民消费水平，通过对与收入、消费相关的变量进行对数处理后，使用系统 GMM 的估计方法对动态面板数据进行检验。表 5 是城镇居民不同来源收入变量对消费影响的检验结果。首先，在基准回归的基础上加入居民人均转移性收入变量，在此基础上陆续引入工资性收入、经营性收入和财产性收入三个变量，可以发现：城镇工资性收入、财产性收入对居民消费的影响显著为正，在控制其他变量的情况下，工资性收入每提高 1%，城镇居民人均消费增长 0.201%；财产性收入每提高 1%，城镇居民人均消费增长 0.051%。我们发现城镇工资性收入对居民消费的拉动作用要明显大于财产性收入，这可能是因为对城镇居民来说工资性收入作为稳定性收入是可预见的，有稳定性收入的居民，相对收入变动的不确定性程度也会较低，从而无需准备过多储蓄来应对未来的消费支出；而财产性收入由于其不稳定性特征，居民会将这部分收入作为储蓄，以应对未来的消费支出。转移性收入对城镇居民消费的影响并不显著，可能的原因在于离退休金是城镇居民转移性收入的主要组成部分，而退休金主要针对的人群是老年人，老年人的消费能力相对弱（巩师恩和范从来，2012）。另外，我们没有找到经营性收入显著影响居民消费的证据。

表 6 是农村居民不同来源收入变量对消费影响的检验结果。对农村居民而言，不同来源的收入对居民消费的影响均显著为正，工资性收入、经营性收入、转移性收入和财产性收入对居民消费影响的弹性系数分别为：0.166、0.272、0.086 和 0.02。我们发现农村居民经营性收入、工资性收入对居民消费的影响要大于转移性收入、财产性收入，这与侯石安和赵和楠（2012）的结论是一致的，但是侯石安和赵和楠（2012）没有对实证结果做出解释。从收入不确定角度来看，农村经营性收入、工资性收入具有持久性收入的特征，更为稳定且波动性小，而转移性收入和财产性收入是农村居民的“意外之财”（张秋慧和刘金星，2010）。拥有不稳定收入的居民相比稳定收入的居民来说边际消费倾向低，主要是因为稳定收入的居民无需去储蓄来应对收入的变动给自身带来的影响（Friedman，1957）。

另外，城乡居民收入对消费影响的差异较为明显，主要表现在：第一，城镇人均可支配收入对居民消费的影响大于农村人均纯收入。第二，城镇不同来源的收入对居民消费的影响大于农村。以工资性收入为例，城镇工资性收入每提高 1%，人均居民消费提高 0.201%；农村居民工资性收入每提高 1%，人均居民消费提高 0.166%。总体看来，我国城镇居民对不同来源的收入有更强的

消费意愿，消费市场的主力在城镇。

表 5 城镇居民不同来源收入对消费的影响分析

变量	(1) consume	(2) consume	(3) consume	(4) consume
L.consume	0.952*** (0.086)	0.612*** (0.135)	0.589*** (0.085)	0.558*** (0.085)
childratio	-0.098 (0.141)	-0.436** (0.196)	-0.443*** (0.121)	-0.460*** (0.101)
oldratio	0.190 (0.182)	0.433 (0.304)	0.397 (0.245)	0.603** (0.157)
inflation	-0.412*** (0.133)	-0.645*** (0.165)	-0.209** (0.082)	-0.144*** (0.075)
increase	0.697*** (0.130)	0.447** (0.224)	0.291 (0.196)	0.229* (0.130)
inequality	-0.005 (0.005)	0.001 (0.014)	-0.000 (0.011)	0.015 (0.009)
transfer	0.007 (0.016)	0.036 (0.044)	0.036 (0.030)	0.068 (0.023)
wage		0.134** (0.059)	0.166*** (0.051)	0.201* (0.031)
operate			0.014 (0.018)	0.044*** (0.011)
property				0.051** (0.010)
常数项	0.488 (0.705)	2.025*** (0.572)	1.882*** (0.393)	1.574*** (0.418)
AR (1)	0.013	0.054	0.074	0.098
AR (2)	0.234	0.378	0.865	0.578
Hansen 检验	0.301	0.321	0.159	0.197
省份数量	31	31	31	31

注：(1)\*、\*\*、\*\*\*分别表示在 10%、5%、1%显著水平下的显著性；

(2) 残差的一阶和二阶序列相关检验和 Hansen 检验所报告的均为 P 值。

表 6 农村居民不同来源收入对消费的影响分析

变量	(1) consume	(2) consume	(3) consume	(4) consume
L.consume	0.722*** (0.194)	0.526* (0.272)	0.590*** (0.212)	0.449** (0.202)
childratio	-1.374** (0.648)	-1.151* (0.654)	-0.260* (0.150)	-0.172 (0.172)
oldratio	1.656* (0.907)	-0.006 (0.741)	-0.102 (0.311)	-0.045 (0.322)
inflation	-0.684*** (0.252)	-0.655** (0.275)	0.004 (0.190)	0.041 (0.152)
increase	0.069 (0.238)	0.179 (0.327)	-0.001 (0.212)	0.075 (0.186)
inequality	0.243** (0.116)	0.202 (0.145)	0.062** (0.029)	0.084*** (0.031)

(续表)

变量	(1) consume	(2) consume	(3) consume	(4) consume
transfer	0.115** (0.047)	0.116** (0.054)	0.067* (0.037)	0.086*** (0.032)
wage		0.197** (0.096)	0.118* (0.061)	0.166*** (0.062)
operate			0.197* (0.105)	0.272*** (0.099)
property				0.020* (0.012)
常数项	1.083 (1.292)	1.478 (1.829)	0.482 (0.530)	0.406 (0.385)
AR(1)	0.009	0.041	0.005	0.036
AR(2)	0.208	0.182	0.12	0.176
Hansen 检验	0.117	0.1	0.392	0.374
省份数量	26	26	26	26

注：(1) \*、\*\*、\*\*\*分别表示在 10%、5%、1%显著水平下的显著性；

(2) 残差的一阶和二阶序列相关检验和 Hansen 检验所报告的均为 P 值。

#### 四、结论、政策建议与进一步研究方向

本文采用系统 GMM，对中国城乡居民样本进行了一系列实证研究，主要结论如下：

首先，利用 2002-2013 年的省级面板数据，考察了城乡居民消费水平的影响因素，发现：城乡居民收入对居民消费水平的影响显著为正，弹性系数分别为 0.366 和 0.297；城镇、农村消费都存在较强的惯性，惯性系数分别为 0.50 和 0.730；城镇居民通货膨胀对居民消费水平影响系数的符号符合预期，即通货膨胀率的上升会降低城镇居民消费水平。

其次，对城镇居民而言，工资性收入和财产性收入对居民消费的影响显著为正，这两项收入对消费影响的弹性系数分别为 0.201、0.051，工资性收入对城镇居民消费的拉动作用大于财产性收入；对农村居民而言，四种不同来源的收入对居民消费的影响均显著为正，工资性收入、经营性收入、转移性收入与财产性收入对消费影响的弹性系数分别为：0.166、0.272、0.086 和 0.020，经营性收入、工资性收入对农村居民消费的拉动作用大于转移性收入与财产性收入。

根据以上结论，我们提出如下政策建议：

第一，针对城镇居民，政府短期内应提高工资性收入和财产性收入，有助于拉动城镇的消费市场。一是建立并完善最低工资制度和职工工资增长机制；二是大力完善资本市场，促进股票、债券、基金市场的发展，拓宽城镇居民投资资本市场的途径。

第二，针对农村居民，一方面大力发展县域经济，在此基础上提高农村居民工资性收入与经营性收入；另一方面，完善社会保障制度，加大对农村居民的转移支付、提高农村居民的财产性收入。

本文利用省级动态面板数据实证分析了不同来源收入对城乡居民消费的影响，但是目前考虑不同来源收入对城乡居民消费影响的微观实证文献相对较少，下一步可从微观视角出发，详细分析家庭内部工资性收入、财产性收入、转移性收入以及经营性收入对居民总体消费与各分项消费支出的影响。

## 参考文献:

- [1] 陈春良, 易君健. 收入差距与刑事犯罪:基于中国省级面板数据的经验研究[J]. 世界经济, 2009(1):13-25.
- [2] 方福前, 张艳丽. 城乡居民不同收入的边际消费倾向及变动趋势分析[J]. 财贸经济, 2011(4):22-30.
- [3] 巩师恩, 范从来. 中国城镇居民分项收入的消费促进效应研究——基于 2002-2009 年省级面板数据[J]. 江苏社会科学, 2012(1):56-60.
- [4] 韩海燕, 何炼成. 中国城镇居民收入结构与消费问题实证研究[J]. 消费经济, 2010(3):8-12.
- [5] 侯石安, 赵和楠. 城乡居民收入来源构成对其消费行为的影响[J].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学报, 2012(6):28-34.
- [6] 雷理湘, 胡浩. 农村居民不同收入来源的边际消费倾向实证分析——基于 1997-2013 年分省面板数据[J]. 消费经济, 2015(6):34-39.
- [7] 李春琦, 张杰平. 农村居民消费需求与收入构成的关系研究——基于面板数据的分析[J]. 上海经济研究, 2011(12):36-44.
- [8] 李文星, 徐长生, 艾春荣. 中国人口年龄结构和居民消费:1989—2004[J]. 经济研究, 2008(7):118-129.
- [9] 易行健, 杨碧云. 世界各国(地区)居民消费率决定因素的经验检验[J]. 世界经济, 2015(1):3-24.
- [10] 张秋惠, 刘金星. 中国农村居民收入结构对其消费支出行为的影响——基于 1997~2007 年的面板数据分析[J]. 中国农村经济, 2010(4):48-54.
- [11] 职建仁, 王紫燕. 低碳经济下重庆新型城镇化建设研究[J]. 中国农业资源与区划, 2016, 37(12):57-61.
- [12] Arellano M, Bond S R. Arellano, B.: Some Tests of Specification for Panel Data: Monte Carlo Evidence and an Application to Employment Equations[J]. 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 1991, 58(2):277-297
- [13] Blundell R, Bond S. Initial conditions and moment restrictions in dynamic panel data models[J]. Journal of Econometrics, 1998, 87(1):115-143
- [14] Carriker G L, Langemeier M R, Schroeder T C, et al. Propensity to Consume Farm Family Disposable Income from Separate Sources[J]. American Journal of Agricultural Economics, 1993, 75(Special\_Issue)
- [15] Friedman. M. A theory of the consumption function[M].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57.
- [16] Modigliani F, Cao S L. The Chinese Saving Puzzle and the Life-Cycle Hypothesis[J]. 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 2004, 42(1):145-170
- [17] Roodman David, 2006, "How to Do xtabond2 :An Introduction to "Difference" and "System" GMM in Stata" [R], Working Paper , pp.1-51
- [18] Sand R. The Propensity to Consume Income from Different Sources and Implications for Saving: An Application to Norwegian Farm Households[J]. General Information, 2002.
- [19] Thaler R H. Mental accounting matters[J]. Journal of Behavioral Decision Making, 1999, 12(3):183 - 206.
- [20] Thaler R H. Anomalies: Saving, Fungibility, and Mental Accounts[J].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 1990, 4(1):193-205

## The Effects of Different Sources of Income on Urban and Rural Residents Consumption in China: An Empirical Test Based on the Provincial Panel Data from 2002 to 2013

YI Xing-jian, ZHU Li-wei, YANG Bi-yun

**Abstract:** Based on the provincial panel data from 2002 to 2013 in China, this paper empirically analyses the effects of different sources of income on urban and rural residents consumption behavior. The empirical results show that: (1)the impact of income on urban and rural residents' consumption is significantly positive, urban and rural residents have a strong consumption habit, the increase of inflation will reduce urban residents consumption; (2)For urban residents, the effect of wage and property income on consumption are positive, the coefficient are 0.201 and 0.051 respectively; (3)For rural residents, the impact of four different sources of income on consumption are significantly positive, the order of which on consumption from high to low is: operate income, wage income, transfer income and property income.

**Key Words:** Wage income; Property income; Residents consumption; GMM

〔执行编辑: 秦光远〕